

汉字测试在韩“国别化”汉语测试中的地位探索

常庆丰* · 毕奎**

目 录

1. 引论
2. 前人研究状况回顾
3. 国别化汉语测试中加强汉字测试的必要性探讨
 - 1) 语言测试理论领域的探讨
 - 2) 国别化汉语测试中体现出的汉字教与学的关系
4. “字本位”启发下的汉语教学与测试
5. 结论

1. 引论

中韩建交20多年来，在韩中文教学事业也步入了迅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不仅体现在发展速度、规模和层次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师资队伍、教学、科研和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然而，在韩中文教学领域，尤其是在大学中文教育领域，我们从吕必松(1992)教授教学四大环节¹⁾的观点来看，四大环节还存在下面的问题：至今还未建立起早就应有的汉语教学大纲（大学）；教材编写方面虽然数量众多，然而因为缺少指导性思想及合理的评价体系，使得教材编写的目的性普遍不够明确，很难形成系统性教材；课堂教学的无序化明显；至今没有一个“国别化”的汉语水平测试系统。以上这

* 中国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

** 中国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

1)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世界汉语教学》1992年第2期。

些弊端，不能不说是在韩中文教学的些许遗憾。

本文尝试论述在韩国研制并实施一种有别于以“新HSK”为代表的汉语水平测试系统，“国别化”和“考教结合”、“以考促教”是这种新的汉语测试系统的重要特点。而汉字方面的考察，应该在新的测试系统中占据相应的地位。

从学习者数量来看，韩国的汉语学习者数量在全球可以说名列前茅。2009年11月，中国国家汉办为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需要，改革旧汉语水平测试(HSK)，推出新HSK。2010年，新HSK在全球63个国家的174个考点举行了9次考试，据相关数据统计(2011)²⁾，新HSK开始进行的第一年，有98,291人次参加考试，比2009年人数增长幅度为29.18%。而其中，韩国考生为53,445人次，占全球考生人(次)数的54.37%！而且参加考试人数还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拥有如此大数量的学习者，必然使汉语教学已经成为韩国外语教学中的重中之重。虽然我们知道，新HSK以旧HSK为基础，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摸索，形成了比较完整、合理、科学的测试评价体系，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HSK所针对的对象是全球的汉语学习者，HSK所依托的理论基础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及以前所谓“对外汉语”)的各项理论和实践。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性的把握。测试中“全球化”的思路不言而喻。然而，根据每个国家学习者情况的不同，“国别化”测试应当早日建立起来，与“全球化”测试，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把整体与个体、共性与个性都在测试中得到体现。这样，对在韩中文教学的成果检验一定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对应试者的语言水平会有更公平的展示，也会使测试的准确度得到相应的提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语言测试，不管是汉语的新HSK，还是英语的TOEFL、TOEIC考试，都试图以“考教结合”、“以考促教”作为其根本出发点。很难想象，在韩国，对如此大数量的汉语学习者实施的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却没有建立一个自己测试系统作为评价体系的核心，而仅仅依靠一个国外的语言测试系统，这样怎样能科学地检验出教学成果？怎样促使学习者达到一定的学习目标？其结果，必然是割裂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在韩的汉语教学，尤其是大学汉

2) 罗民等，《新汉语水平考试(HSK)海外实施报告》，《中国考试》2011年第4期。

语教学，长期处在一个无序的混乱状态。因此我们认为，研制一个新的国别化汉语测试系统，有利于促进制定详细有效的教学大纲，有利于促进实现各阶段的教学目标，有利于检验个阶段教学成果。我们认为，目前在韩研制并实施汉语水平测试系统的各项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

其实，韩国的中文学者并非没有尝试制作在韩“国别化”汉语测试系统。比如，韩国外国语大学就制作了FLEX中文测试。首尔大学也进行了相关的尝试。很遗憾，在我们看来，FLEX中文测试并未体现出韩国学习者的特征，似乎延续了老HSK的测试形式和测试思路，在测试理念上明显落后于新HSK，跟日本的“中国语检定试验”也有一定的差距。FLEX给我们的印象，有点像英文测试内容的中文翻译版。因此，不管是韩国外大还是首尔大学，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国别化”汉语测试系统的尝试是不完全成功的。

我们希望研制的汉语测试系统，应能最大程度地反映韩国学习者的学习特点，重点突出表现出“国别化”和“考教结合”、“以考促教”的特点。我们希望通过新测试系统的建立，促进吕必松先生提出的四大教学环节：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成绩测试，在韩国的汉语教学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链条，而不是各自孤立运行个体操作。

既然我们提到“考教结合”、“以考促教”，从现有的综合汉语水平考试，尤其是具有比较权威影响的新HSK考试，从1级到6级，并未在汉字专项测试方面有所关注。这与韩国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不符。过去，中国的对外汉语学界一直有日韩学生学习、书写、运用汉字没有大问题的观念，可是，从建交后20多年的在韩中文教学状况来看，这一观念并不符合韩国学习者，尤其是青少年学习者的实际状况。汉字教学，从认读到书写、运用，汉字已经成为在韩学习者的一个“软肋”。从另一方面看，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在韩文中取消了汉字（朝鲜则更早）后，汉字教学已经从小学、中学、高中教育中逐步退出了第一线，虽然目前韩国仍然有针对不同层次学习者的汉字考试，但被忽视程度也逐年递增。甚至对中国人名的汉字读法，近年来韩国教育部也出台了新的规则，不再读汉字的韩国本音，而是标识汉字的中文发音。这样的政府行为，无形中挫伤

了韩国学生学习汉字的热情，也使韩文出现了“去汉字化”的趋势。很多年轻人，甚至是中文系的学生，都不了解在韩文中存在很多“汉字词”的现象。

我们可以理解新HSK中对汉字测试的“漠视”现象，因为毕竟新HSK是面对全世界汉语学习者的测试，无法一一照顾不同国别的学习者的具体状况。所以，我们希望能韩建立新的国别化汉语测试，并把汉字的测试纳入较重要的地位。

2. 前人研究状况回顾

中国语言学界在语言测试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原版引进或翻译国外语言测试理论，或利用这些理论在英语测试方面做出一定研究；如专著方面：Cycil J. Weir(2010)³⁾、James Dean Brown(2006)⁴⁾、罗少茜(2009)⁵⁾、王振亚(2009)⁶⁾等，论文方面，杨满珍(2002)⁷⁾、李欣等(2004)⁸⁾、陈纪梁等(2005)⁹⁾、刘壮等(2008)¹⁰⁾、刘振卫(2010)¹¹⁾等等；这部分研究，主要对国际上通行语言测试理

3) Cycil J. Weir著，《语言测试与效度验证：基于证据的研究方法(Language Testing and Validation: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公司，2010年6月。

4) James Dean Brown著，《语言项目中的测试与评价(Testing in Language Program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English Language Assessment)》，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

5) 罗少茜著，《任务语言测试中的任务难度研究(Re-examining Factors That Affect Task Difficulty in TBLA)》，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

6) 王振亚著，《现代语言测试模型(Modern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esting)》，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7) 杨满珍，《20世纪90年代国外语言测试的发展》《外语教学》2002年9月。

8) 李欣等，《论客观语言测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

9) 陈纪梁等，《二语习得与语言测试研究接口的可能性及其现状研究》，《外语学刊》2005年第4期。

10) 刘壮等，《对任务式语言测试的探索》，《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2期。

论进行整理和说明,同时也利用这些测试理论,对中国国内现有的比较成熟的各项英语测试进行分析,尤其是针对英语测试所应遵循的英语能力标准、测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测试的效度信度做进一步分析,以进一步深化中国国内英语测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在汉语测试研究方面,尤其是新HSK推出以来,中国学者也根据上述语言测试理论,对以HSK为代表的汉语测试系统,进行汉语能力标准的探索,分析《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R)》在汉语水平考试中的指导作用,针对HSK、BCT等汉语测试做一些量化的研究和数据的统计和测量。这些研究成果多出自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汉语测试机构。其中,张凯、王佶旻、杨翼、张旺熹等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出色的研究成果。如专著方面,张凯(2006)¹²⁾、杨翼(2008.2010)¹³⁾、张旺熹(2010.2011.2012)¹⁴⁾、王佶旻(2011)¹⁵⁾等等;论文方面,何干俊(2010)¹⁶⁾、徐海冰(2011)¹⁷⁾、罗莲(2012)¹⁸⁾等等。这些成果主要是对已有测试进行量化分析,希望得到一个信度和效度的测量结果,并以此为借鉴,改善测试方式,改

-
- 11) 刘振卫,《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对我国制定统一的英语能力标准的启示》,《安徽文学》2010年第10期。
- 12) 张凯著,《语言测试理论及汉语测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
- 13) 杨翼著,《汉语教学评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
杨翼著,《对外汉语教学的成绩测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 14) 张旺熹等,《汉语测试、习得与认知探索》,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张旺熹等,《汉语测试、习得与认知探索(续一)——“第二届语言测试与系的研究学术论坛”论文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5月。
张旺熹等,《汉语测试、习得与认知新探索》,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3月。
张旺熹著,《语言测试的跨学科探索》,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2年6月。
- 15) 王佶旻著,《汉语测试探微》,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 16) 何干俊,《普通话水平测试与汉语水平考试的比较研究及实践》,《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2010年6月。
- 17) 徐海冰等,《〈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兼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比较》,《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1年第31卷第5期,2011年5月。
- 18) 罗莲,《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分级测试设计与实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7卷第3期,2012年3月。

善题型等，以进一步使测试更加适合应试者的能力。

由此看来，中国学者针对已有的较成熟的语言测试系统做了比较有针对性的研究。而且中国学者对建立汉语测试系统无一反对，以HSK为代表的测试系统的建立迅速而有效。学者们普遍认为，“研制并在全世界推广我们自己的汉语水平考试，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要历史使命”(2009:8)¹⁹⁾。也不少学者认为，很多中国的汉语学者在向世界推广汉语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带上了“政治”和“官方”的色彩，总希望把汉语早日推广成为世界上真正的“大语种”，当然这与中国是汉语的故乡密切相关，研制一个权威性、全球性的汉语水平考试当然也被中国的对外汉语学者认为是理所担当的使命，中国国家汉办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和投入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韩国的中文学者一直比较注重对汉语语言本体或文学文化层面的研究，而较轻视汉语教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把汉语教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外语教学学科，从而作为研究对象，这对韩国学者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因此，韩国学者对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开发做出的努力也较少，出现的论文、专著也不多见。虽然前几年有学者曾经提出在韩创建一个汉语测试系统，但也许终因“曲高和寡”，难度太大，不了了之。

桂诗春(2002:14)²⁰⁾曾引用语言学家麦基(Mackey W.F.)的一句颇有深意的话：“语言教学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就必须像其他科学那样，编织自己的渔网，到人类和自然现象的海洋里捞取所需的东西，摒弃其余的废物；要能像鱼类学家阿瑟·爱丁顿那样说，‘我的渔网里捞不到的东西不会是鱼’。”桂诗春(2005)²¹⁾还指出，“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应用型的交叉学科，它的基本特点是在学科中间起中介作用，即把各种与外语教学有关的学科应用到外语教学中去。”组织外语教学的许多重要环节（如教育思想、教学管理、教学组织、教学安排、教

19) 刘镰力著，《汉语水平测试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8页。

20) 桂诗春主编，《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4页。

21) 桂诗春，《外语教学的认知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材、教法、教具、测试、教师培训等等），既有等级的，也有平面的关系。而教学措施上升为理论之后，语言教学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李泉(2002)²²⁾在总结当时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基本理论时，提出了应由四个部分构成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1) 学科语言理论，包括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理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言学；(2) 语言学习理论，包括基本理论研究、对比分析、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理论；(3) 语言教学理论，包括学科性质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法理论；(4) 跨文化交际理论。

而在韩国，中文学者往往过多强调学科语言理论，注重对汉语本体研究，而忽视了对语言教学理论的应用。而我们认为，这一应用十分重要，关系到在韩汉语教学质量和学习者的学习效率。这一应用包括教学设计与技巧、汉语测试的设计与实施。只有应用得当，理论才能发生实际效用，理论才能在教和学过程中起到提升与先导作用。

中国的对外汉语学界较早提出了“国别化”教学的概念，中国国家汉办近年来也努力提倡编写“国别化”教材。然而其“国别化”教学的进展并不快，很多所谓“国别化”教材也不过是中国学者编写教材的各种语言翻译版本，并没有真正实现更深层次的“国别化”。而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别化测试系统，在中国对外汉语学界，更是很少有人提出并尝试。

从以上状况来看，中韩两国学者并非对研制这样的测试没有兴趣，而是可能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在学术研究中刻意回避了该议题。

3. 国别化汉语测试中加强汉字测试的必要性探讨

1) 语言测试理论领域的探讨

语言测试从上世纪60年代起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可以说，语言

22) 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本理论》，《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3.4期。

测试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一般来说,我们认同一种普遍的看法:语言测试属于应用语言学。

关于语言测试的学科地位,语言学家艾伦·戴维斯(Alan Davies)(2006 : 3)²³⁾曾经有过非常精辟的描述:“语言测试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从1961年Robert Lado 写<Language Testing:the Construction and Use of Foreign Language Test>时应用语言学的配角,转变为今天应用语言学中居主导地位的角色,原因在于,它使用明显有活力的方法去面对语言学习和语言应用中的主要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语言测试一直在使自己从只具有实践意义向着既有实践意义也具有理论意义的方向转变。惟其如此,它才既获得了学院派的尊敬,又开始具备了解释力。”由此看来,语言测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地位越来越高,语言测试是一门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的学科。

从应用层面上,语言测试的作用是测量人的语言能力、语言知识或语言技能;而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对语言能力等做出描述、说明,甚至是预测,而这一切,也需要实践的检验。从学科发展来看,语言测试是在语言学、心理学和测量学的共同影响下出现的。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来说,其中语言学属于人文科学,测量学属于自然科学,而心理学则同时存在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中。当然,语言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越来越多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使其比其他人文科学具有更多的自然科学性质。因此我们把语言测试看成一门交叉学科,它融合了自然科学的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态度。既然是交叉学科,那么我们研究的也将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语言测试的对象,一个是语言测试研究的对象。通俗的说,我们要研究语言测试中的语言本体方面,包括语言理论、语言知识和语言行为,也要研究测试的可靠程度、精确程度等等。

随着语言学理论的深入研究,语言测试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我们都知道,语言学理论领域,从上世纪50年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到70年代,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逐渐占据主流。格林(Green J.)

23) 艾伦·戴维斯(Alan Davies)著,《应用语言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8月,第3页。

(1972:1)²⁴⁾曾经说,“自1965年以来,语言学的一切发展都是乔姆斯基关于语言学理论的目标的思想促成的。”语言能力这个概念也是从乔姆斯基那里开始出现。乔姆斯基理论和语言教学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认为,用乔姆斯基理论作为语言测试和语言教学的基础是恰当的。语言测试相对于语言教学过程,是一个操作性和实践性更强活动,通过语言测试,可以更好地把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与语言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可以把语言教学推向更深更广的层面。

乔姆斯基(1965:6)²⁵⁾提出,“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是相对的概念,语言能力指的是“说话人—听话人”知道的东西,语言应用是指“说话人—听话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乔姆斯基(1986:13)²⁶⁾还曾经说语言能力是人的一种心理状态,从初始状态到稳定状态都是语言能力的状态,初始状态是普遍语法,而稳定状态中就包含了内化的语言。所谓初始状态,通俗地说,就是人的出生状态,人脑中在那时已经有了后天形成语言所必需的生物机制。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作用下,这种机制发生作用,使人至少学会一种语言。而达到稳定状态后,人们下意识知道的东西,乔姆斯基叫它“语言知识(Knowledge of Language)”,正是这样的知识,是人们能够运用语言。在这里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是相同的概念。

从上面的观点来看,以前在第二语言教学和测试中,人们常常认为“语言能力”是“学习”来的。其实不然,按乔姆斯基(1986)²⁷⁾的说法,转换生成语法是为了解决下面几个问题:语言知识是有什么构成的?语言知识是怎样获得的?语言知识是怎样运用的?而人们的初始状态都是一样的,都具有普遍语法的原则,也就是说,语言能力是人们天生就有的,这种能力在后天环境作用下,成

24) Green J.(1972)著,《乔姆斯基》,方立、张景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1页

25) 乔姆斯基(Chomsky)(1965)《句法理论要略(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熊仲儒,张孝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第6页。

26) 乔姆斯基(Chomsky)(1986)《语言知识:其性质、来源和使用》(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程工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1月,第13页。

27) 同注26

为特定语言的语言能力,随着这个能力的不断完善,最后达到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最终学会一种语言。由此看来,语言测试和语言教学所探索的根本目的,都是探索语言能力的本质,这与乔姆斯基理论是一致的。

当然乔姆斯基的理论并不涉及第二语言习得,他提出的“说话人—听话人”是拟向的母语者。从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测试的角度来看,母语者对语言能力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评价语言能力的唯一可靠的标准就是母语者。在语言测试发展过程中,曾经有学者认为,外语教学和测试不一定以母语者为标准,对此,Oller(1979:12)²⁸⁾说,以(外语教学和测试)外语者为标准,就好像真品随处可得却买了赝品一样。因此,我们要建立的国别化汉语测试也必然需要汉语母语者,也就是中国学者的参与研发。

而现代语言测试理论,依据此,由美国教育家John Oller(1979)²⁹⁾提出“整体语言能力假设(the Unitary Competence Hypothesis)”,认为测试中不应仅有分立式试题,还应该有面试、作文、听写等“综合”测试试题。Oller提出用完形填空(Cloze Tests)和听写测试(Dictation Tests)取代其他测试方式。这一观点与分立式测试方式针锋相对。

8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越来越为学者们所认知并接受,大量的语言学者的研究兴趣从语言形式逐步扩展到语言交际。

美国社会学家海姆斯(Hymes D.H.)(1972)³⁰⁾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其内涵包括了形式上的可能性、心理上的可行性、语境上的得体性和运用上的现实性四个部分。强调仅有语言形式上的知识,无法保证交际过程的流畅,从而达到交际目的,应该拓展人们对语言交际的视野。随着交际语言功能的提出,交际性测试也就成了语言测试领域的热点。

语言能力理论逐渐在语言测试领域受到重视。我们都知道,结构主义语言

28) John Oller著,《学校语言测试(Language Teses at School)》,英国London: Longman, 1979年6月

29) 同注28。

30) 海姆斯(Hymes D.H.)著,《论交际能力(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72年4月。

理论中, 虽然索绪尔 (Saussure) (1916)³¹⁾很早就提出了把“言语活动 (language)”区分为“语言 (langue)”和“言语 (parole)”的概念, 但很少涉及人的语言能力的研究。因此,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 语言测试往往借助于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来解释语言能力的形成。而正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 把语言结构和语言能力结合了起来。普遍语法理论既是语言学理论, 又是语言能力理论。以此为基础的语言测试从此走上了正规, 而不再需要借助心理学的能力理论了。

Bachman(1990)³²⁾提出“语言交际能力模型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CLA)”的概念, 这是语言测试学家对语言能力的有利探索。在对语言能力的研究中, 越来越多的学者希望能找到一个关于语言能力准确的、有经验基础的描述, 并致力于开发一个“通用语言力量表”, 希望这一通用量表不受语境、水平、语种等条件的限制。

Bachman(1987)³³⁾对此还专门做了描述: “这样的量表有明显的优点, 根据它开发的测试可作为定义和测量语言能力的标准, 而这将不依赖特定的语言、语境和语域。建立在这个量表上的测试分数于是可以做跨语言和跨语境的比较。”

可见, 这一理论, 不仅满足于测试语言能力, 而是企图进一步掌握语言能力的本质和性质。目前世界上虽然还没有这样一个通用的语言力量表, 但欧共体开发研制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EFR)》, 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而中国国家汉办(2007)制定的《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也正是沿用这一思想做出的一些努力。本文在探讨研制国别化汉语水平考试的过程中, CEFR也必然作为我们依据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31) 索绪尔 (Saussure) 著, 《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14年7月

32) Bachman著, 《语言测试中的基本注意事项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英国: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年2月。

33) Bachman & Clark著, 《外语/第二语言能力的测量 (The Measurement of Foreign /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美国: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87年6月。

语言测试的发展,随着语言学和语言测试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比较长的时期。比较被公认的是以色列著名应用语言学家伯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1977)³⁴⁾的三时期分法:前科学或传统(Tranditional)时期、心理测量—结构主义(Psychonemetric-structuralist)或现代(Modern)时期、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ociolinguistic)或后现代(Postmodern)时期。

从语言测试的发展来看,理论界普遍认可,对语言能力(Competence)的研究问题是语言测试研究的基本问题,语言测试的最终目标就是研究人的语言能力。对语言能力的研究和解释,才能使语言测试的结果最终应用于语言教学实践,因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目的,就是使学习者获得一种语言的语言能力。CEFR(2008:6)³⁵⁾中有这样的描述:“任何形式的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都具有以下特征:语言使用,包括语言学习是作为个体的人,或者作为社会人完成的行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发展了自己的综合能力,尤其是运用语言交际的能力。他们会根据各种不同的环境和条件,运用所掌握的各种能力,包括随遇而安的能力和选择完成任务所需的最恰当策略的能力,去实施语言活动,处理(输入和输出)具体领域的文本。对话方这类语言活动的监督有助于加强或是改善语言使用者和学习者的能力。”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语言能力已被公认为语言测试的根本问题。然而,我们看到的现代语言测试理论,对语言能力的描述,仍然是以西方语言为基础的,尽管CEFR也努力使其描述更尽可能的“国际化”,但汉语固有的汉字表现形式,却很难使汉语测试完全套用这一模式。而中国国家汉办制定的《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也对汉字的测试要求提得较少。

从另一方面来看,现代语言测试虽然经历了从分立式测试到综合测试、交

34) Spolsky, B., 《语言测试:艺术还是科学(Language Testing :Art or Science)》,第四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7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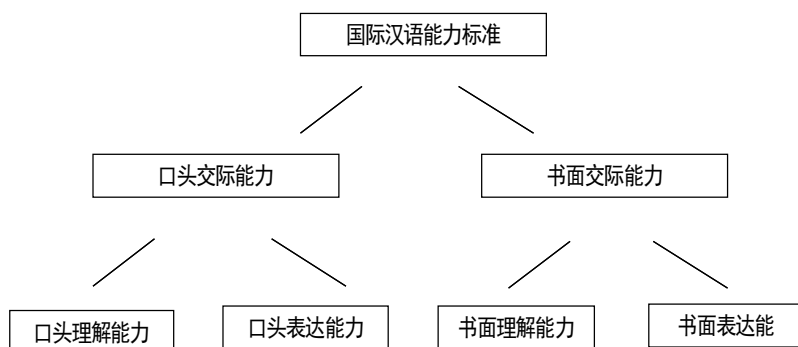
35)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The Council of Europe's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learning, teaching and testing, CEF/CEFR)》,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12月,第6页。

际性测试的发展，但我们强调后者的同时，是否就是对前者的完全否定？从汉字的特点来看，分立式测试是否就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在测试中的地位？这些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西方现代语言测试学家以西方语言为基础，建立了各种语言交际能力模型，我们应该看到，汉语以汉字为基本表现方式的特点，在其模型中，并未得到应有的表现。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于2007年研制出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2007:2）³⁶⁾。该标准明确指出：“《标准》借鉴了CEFR(The Council of Europe’s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learning, teaching and testing)、CLB(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等国际语言能力标准的研制成果。……《标准》是对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汉语能力的描述，不是对汉语本身的描述。……《标准》的研制在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我们从该标准制定的“国际汉语能力标准框架图”和“汉语能力总体描述”量表中，可以看到明显的CEFR痕迹。也能看出其中，对汉字能力的表述是有明显的缺失的。

上图：国际汉语能力标准框架图



36)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3月，第2页。

上图：汉语能力总体描述³⁷⁾

等级划分	能力描述
一级	能大体理解与个人或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简单、基础而又十分有限的语言材料。借助肢体语言或其他手段的帮助，能有非常有限的简单语汇介绍自己或与他人沟通。
二级	能基本理解与个人或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熟悉而简单的语言材料。能就常见话题以较简单的方式与他人沟通，介绍自己或他人的基本情况，有时需借助肢体语言或其他手段的帮助。
三级	能理解与日常生活和工作相关的以及在一般交际场合中遇到的基本的语言材料。能就熟悉的话题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能对于这些话题相关的基本情况做简单描述。
四级	能理解一般社交场合活在工作、学习等场合遇到的表达清晰、内容熟悉的语言材料，抓住重点，把握细节。能就熟悉的话题与他人进行交流，表述清楚且有一定的连贯性，会使用基本的交际策略。能描述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看法，给出简单的理由或解释。
五级	能理解多种场合、多种领域（包括个人专业领域）的普通语言材料，能够把握重点，进行概括和分析。能使用多种交际策略较自如地参与多重话题，包括专业领域内一般性话题的交流和讨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并对各种意见进行阐释，表达连贯，基本得体。

2) 国别化汉语测试中体现出的汉字教与学的关系

如何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汉语教学，包括中韩学者在内的全世界汉语学者早就有了基本的共识，即汉语教学的“国别化”。

不管是汉语教学的具体实施者，还是教学者所使用的教材，目前普遍存在一个问题：教学和教材往往是以“教师为中心”，而不是从学习者角度出发。不管中国学者，还是韩国学者，在实施教学、编写汉语教材、制定汉语测试的过程中，只是以自己的母语思维进行。如果不转变思维，尽早把中心转变为“学习者”，所谓“国别化”就无从谈起。

例如长期以来，学者们争议不休的“语”和“文”的关系问题，在汉语教学中何时引入“汉字”，引入的难度标准、数量标准是什么，这些一直困扰着教学

37) 同注30，第7-9页。

者。所有人都知道, 针对西方学生和韩国学生, 当然应该采用不同的汉字“引入”机制, 然而如何不同? 同样属于汉字圈国家的韩国、日本、越南学生, 汉字学习真的就那么容易? “畿”字, 估计80%中国人遇到都会犹豫它的读音和意义, 但略有汉字知识的韩国人一看就明白, 因为“京畿道”这三个字他们天天可以看到; “惠”字在HSK大纲中出现在5级词中, 可是韩国女性中用“惠”做名字的人占到相当的比例, 比如当今的总统“朴槿惠”女士。教学实施和教材制定如何体现出“国别化”, 尤其是汉字教学的国别化, 必然就应该在测试中反映出来。

R.Marger(1962)(2012:16)³⁸⁾指出, 教学模式应包含四个要素: 教学目标、预估、教学程序和评价。他还形象地用3个问题来概括教学设计中的环节: “我要去哪里”(即制定教学目标)、“我如何去那里”(即包括学习者起始状态的分析、教学内容的分析与组织、教学方法与媒介的选择)和“我怎么判断我已经到达了那里”(即教学评价)。吕必松(2007:1)³⁹⁾把语言教学的全过程和全部教学活动分为四大环节, 即: 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这一观点已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所公认。由此可见, 语言测试与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然而从现有的各国汉语测试情况来看, 虽然各种汉语测试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考教结合”、“考学结合”、“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等, 但在实践中却比较难是实现, 或忽视了这一点。

邵瑞珍(1916-1998)(1983:10)⁴⁰⁾总结了美国学者Dick & Carey的教学模式, 从现代教育技术学角度, 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学设计模型, 其中评价、测试是教学过程的必要组成环节, 与教学目标的确立构成教学设计的起点和终点; 没有总结性评价, 就无法判断教学目标是否达成, 也就无法评价教学

38) R.Marger著, 《教学目标的准备》, 转引自Robert J. Marzano, Debra J., Robert J. Marzano著, 《学习目标形成性评估与高效课堂(Learning Goals & Objectives, Formative Assessment & the Hinghly Engaged Classroom)》中译本, 邵钦瑜、冯蕾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年8月, 第16页。

39) 吕必松, 《汉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 第1页。

40) 邵瑞珍著, 《教育心理学: 学与教的原理》,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3年9月, 第10页。

是否有效；没有形成性评价就无法诊断阶段性目标是否达成，就无法诊断学生学习过程和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无法调整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无法实施有效教学；没有对整个教学设计的评价也就无法为改进教学设计提供支撑，就会影响教学设计的完善。在这里，我们可以我们希望研制的国别化汉语水平测试系统看做一个“总结性评价”，而学习中的成绩测试，就是一种“形成性评价”。

可见，如果我们在教学中用了很大的精力教授学生对汉字的认识、书写和应用，而我们在测试中却无从专门表现，那如何能谈到测试的“考教结合”、“以考促教”、“以考促学”？测试的结果，是对教学效果合理的反映，如果语言测试与教学脱节，则完全无法反映出教学可能达到的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在韩汉语教学应该有自己适合于自己的评价标准。没有适当的汉语测试作为衡量评价自身教学效果，我们怎么可以检验汉语学习者的受教程度？如果我们引用其他的测试标准（如HSK）评价自己的教学效果，又如何能真实地对自身的教学进行真实的评价？我们应该认识到，正确运用语言测试这个工具，能有效地评估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了解学生的语言熟练程度，针对和分析学生的错误，同时也是促进学生学习的强有力手段。对于我们希望在韩研制的国别化汉语测试的定位，我们认为是在确保该测试系统科学性、客观性的前提下，注重其推广性。使这一语言测量工具不再是一把严厉的尺子，而是鼓励、帮助考生在学习道路上继续前进的推动力。我们希望新的测试系统能够促进学生“学”的积极性，能够激发老师“教”的热情。

英国测试学家A Lan Davies曾指出，“测试不是教学，我们能够而且坚持这样的想法，即测试的运用是有别于教学实践的，它应被看作是一种提供信息的方法，而所提供的信息是科研运用与教学和其他目的的。”(2002)⁴¹⁾

虽然我们以前的学者都认识到了语言测试对语言教学具有反拨作用，尤其是非常注意强调测试对教学的正面反拨作用，但始终有一种看法影响了学术

41) 转引自黄大勇，《语言测试反拨效应研究概述》，《外语教学和研究》，2002年7月第34卷第4期。

界, 吕必松(2006:3)⁴²⁾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汉语水平考试成绩不但跟学生和教师有关, 而且跟教学单位的声誉有关。因此各教学单位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必然要向考试要求、考试内容、考试方法靠拢。这就是HSK的反馈作用。”我们认为, 吕必松先生在HSK研制之初, 提出这样的观点, 是想充分利用汉语水平考试的研究, 极力地促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这本无可厚非。然而我们也从中看出一个语言测试中的老问题: 我们到底应该是先确定“教什么”, 还是应该先确定“考什么”。我们的测试是为教学服务, 还是反之, 教学为测试服务? 是“教什么考什么”, 还是“考什么教什么”?

4. “字本位”启发下的汉语教学与测试

汉语语法学界对汉语“本位”的争论由来已久。潘文国(1997:162)⁴³⁾指出, “‘本位’这个词有三个意思: ①它可以指最重要、最根本的单位, 作为语法研究出发点的单位。第一个提出‘X本位’的是黎锦熙, 他主张的‘句本位’就是以句子为基本出发点的语法研究; ②它可以指语法研究的基本单位, 这种单位还可以不止一个。譬如英语的语法基本单位就有语素、词、短语、句子等; ③它指的是语言基本结构单位, 语法研究的‘基本粒子’。我们交叉使用第一、第三种含义, 但以第三种为主。”

在此我们并不想就语法界的“本位”进行探讨, 更不想介入其争论, 而只是关注在韩汉语教学和测试。张德鑫(2006)⁴⁴⁾指出,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由于‘汉字壁垒’造成了对外汉语教学总体教学效率不高, 始终存在着‘语’和‘文’即口语教

42) 国家汉办考试中心主编, 《汉语水平考试研究·序》,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年7月, 第3页。

43) 潘文国著, 《汉英语对比纲要》,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年3月, 第162页。

44) 张德鑫, 《从“词本位”到“字中心”——对外汉语教学的战略转移》, 《汉语学报》2006年第2期。

学和书面语教学之间的矛盾，听说能力跟读写能力总是不平衡。一般说，学生的书面语能力都低于口语能力，口语学习费时少却效果好，而汉字学习则费时多却效果差。严重的是，这种误区和困境一直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茁壮成长，并可能进一步制约其今后的发展。搞了半个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却至今没能消除，哪怕动摇‘国际世俗’流传久远的‘汉字难学’（乃至殃及整个汉语而被统称为‘汉语难学’）之偏见。”过去这一说法一般来说是指非汉字圈国家的汉语教学，而目前，韩国也随着国内汉字教育淡化的趋势，这一表现逐年明显。法国的白乐桑(1997,1999)⁴⁵更是毫不客气地严厉指出，“目前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着危机。”“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汉语教学还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尊重中文固有的内在规律应该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不能照抄其他外语教学的做法。”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韩国学习者毕竟是处于“汉字文化圈”，对汉字的认知程度总体上还是远远超出西方、非洲、拉美等非汉字圈国家的学习者。然而我们在本文序中提到的状况也不容忽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内虽然近年屡屡有众多学者提出教学应向“字本位”或者“字中心”方向转移，然而表现在测试中，确实谨小慎微地紧紧围绕在“交际性”上不敢越雷池。似乎不提“交际性”就不能成为语言测试，提了汉字测试就一定是走“分立式测试”的老路。在现代汉语测试中，似乎只能在“写作”环节测试应试者的汉字书写能力，如果单独测试汉字和拼音，就变成了“大孽不道”的行为。而与之相反的是，我们在实际教学里的“成绩测试”中，教师们却完全敢于直接面对汉字。反观中国大陆之外的汉语测试，如日本的“中国语检定试验”，就大大方方地使用了新HSK已经早已基本放弃的“分立式测试”方式，直接认知汉字、拼音。

45) 白乐桑，《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白乐桑，《法国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汉字教学讨论会）开幕词和闭幕词》，《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字中心”教学是将赵元任先生的“‘字’是中心主题”论跟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相融合，探求一条对外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张德鑫(2006)⁴⁶⁾指出，“字中心”教学用“汉语的眼光”（而“词本位”是套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认识汉语和汉字，从而能真正“按照汉语本来面目来教汉语”。“字中心”能体现汉语的综合性和模糊性特色，符合东方思维模式。“字中心”教学可以涵盖“字本位”教学的要义并突破其局限而具更大空间和更多包容，是一条更宽阔、更实用、更自主的对外汉语教学路子。白乐桑等法国学者作为西方人却不是本能地用“印欧语的眼光”，而用“汉语的眼光”来评说汉语教学。倘若将对外汉语教学比作国画，在画布上是无法泼墨的，而“嫁接”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词本位”教学路子恰似“画布”，用来画中国画确有点勉为其难。只有在“汉语本来面目”的“宣纸”上，也即要用“汉语的眼光”来重新认识汉语和汉字及两者的关系，特别要对汉字教学重新定性、定位，才能“大写意”地画出对外汉语教学这幅“中国画”。

我们韩国的汉语教学也应该认识到“汉字”这一主题在在韩汉语教育和测试中应迅速占领重要的一席之地的重要性。我们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的“考教结合”“以考促教”“以考促学”如何能够真正在国别化汉语测试中得到体现，需要看我们的勇气和智慧。

5. 结论

我们认为，在韩研制国别化汉语测试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完全可以实施。而汉字测试应该在国别化汉语测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局限于“交际性”和“综合性”，而忽视了“分立式测试”的优势。毕竟汉字在汉语中的位置，是西方语言与西方语言测试理论难以涉及的，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回避，正视这一测试形式。

我们希望，我们今后研制的国别化汉语测试，在汉字方面应对受试者产生

46) 同注38。

更多的积极的正面反拨作用。至少表现在（1）由于国别化汉语测试的汉字项目的存在，我们可以检验在韩汉语学习者汉字学习的效果，帮助学习者形成较为积极的学习态度；（2）当国别化汉语测试所考察的汉字“目标能力”与学习者期望掌握的汉字能力一致时，这个测试是可以促进语言学习的；（3）科学、合理的国别化汉语测试，可以促使学习者探索更为有效的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而不是带有功利色彩的“应试技巧”。

我们希望我们研制的国别化汉语测试系统中的汉字测试部分，应该努力做到“考教结合”和“以考促学”“以考促教”，我们所考察的汉字应用能力与实际学习目的不会发生很大的偏离。

参考文献

[中文专著]

-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3月。
- 《汉语水平考试研究·序》，国家汉办考试中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6月。
-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The Council of Europe's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nd testing, CEF/CEFR)》，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12月。
- R. Marger(1962)《教学目标的准备》转引自Robert J. Marzano, Debra J., Robert J. Marzano, 《学习目标形成性评估与高效课堂(Learning Goals & Objectives, Formative Assessment & the Highly Engaged Classroom)》中译本，邵钦瑜，冯蕾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3月。
- 桂诗春主编，《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3月。
- 刘镰力主编，《汉语水平测试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
- 吕必松著，《汉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
- 邵瑞珍著，《教育心理学：学与教的原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8月。
- 王佳旻著，《汉语测试探微》，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 王振亚著，《现代语言测试模型》，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 杨翼著，《对外汉语教学的成绩测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 杨翼著，《汉语教学评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 张凯著,《语言测试理论及汉语测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10月。
- 张旺熹等著,《汉语测试、习得与认知探索(续一)——“第二届语言测试与系的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4月。
- 张旺熹等著,《汉语测试、习得与认知探索》,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
- 张旺熹等著,《汉语测试、习得与认知新探索》,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9月。
- 张旺熹著,《语言测试的跨学科探索》,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中文论文]

- 白乐桑,《法国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汉字教学讨论会)开幕词和闭幕词》,《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
- 白乐桑,《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
- 陈纪梁等,《二语习得与语言测试研究接口的可能性及其现状研究》,《外语学刊》2005年第4期,2005年4月。
- 桂诗春,《外语教学的认知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2005年4月。
- 何干俊,《普通话水平测试与汉语水平考试的比较研究及实践》,《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2010年6月。
- 黄大勇,《语言测试反拨效应研究概述》,《外语教学和研究》,2002年7月第34卷第4期。
- 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本理论》,《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3.4期,2002年3月。
- 李欣等,《论客观语言测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

- 刘振卫,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对我国制定统一的英语能力标准的启示》, 《安徽文学》2010年第10期, 2010年10月。
- 刘壮等, 《对任务式语言测试的探索》, 《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2期, 2008年2月。
- 罗莲,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分级测试设计与实施》,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7卷第3期, 2012年3月。
- 罗民等, 《新汉语水平考试(HSK)海外实施报告》, 《中国考试》2011年第4期, 2011年4月。
- 吕必松著,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 《世界汉语教学》, 1992年第2期。
- 徐海冰等,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兼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比较》,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1年第31卷第5期, 2011年5月。
- 杨满珍, 《20世纪90年代国外语言测试的发展》, 《外语教学》2002年9月。
- 张德鑫, 《从“词本位”到“字中心”——对外汉语教学的战略转移》, 《汉语学报》2006年第2期, 2006年2月。

[英文专著]

- Green J.著, 《乔姆斯基》, 方立、张景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3月。
- 乔姆斯基(Chomsky)著, 《句法理论要略(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熊仲儒、张孝荣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5月。
- 乔姆斯基(Chomsky)著, 《语言知识:其性质、来源和使用》(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程工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年1月。
- 索绪尔(Saussure)著, 《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 2014年7月。
- Bachman & Clark著, 《外语/第二语言能力的测量(The Measurement of Foreign/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美国:Annals of the

-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87年4月。
- Bachman著, 《语言测试中的基本注意事项(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英国: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年4月。
- Cybil J. Weir著, 《语言测试与效度验证: 基于证据的研究方法(Language Testing and Validation: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公司, 2010年2月。
- James Dean Brown著, 《语言项目中的测试与评价(Testing in Language Program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English Language Assessment)》,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3月。
- John Oller著, 《学校语言测试(Language Tests at School)》, London: Longman, 1979年4月。
- Spolsky, B.著, 《语言测试: 艺术还是科学(Language Testing: Art or Science)》第四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7年2月。
- 艾伦·戴维斯(Alan Davies)著, 《应用语言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8月。
- 海姆斯(Hymes D.H.)著, 《论交际能力(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Harmondsworth, England, 英国: Penguin, 1972年6月。
- 罗少茜著, 《任务语言测试中的任务难度研究(Re-examining Factors That Affect Task Difficulty in TBLA)》,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年4月。

Abstract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character test in “Country-specific”
Chinese test in Korea

Chang, Qingfeng · Bi, Lei

Over the past 20 years since China and Korea established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Chinese teaching in Korea has also entered a rapid developing stage. The development includes not only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ing speed and scales, but also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eaching staff, teaching quality, teaching materials etc. However, according to Prof. Lü Bisong,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four teaching steps” mentioned by Prof. Lü,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college. These problems are: 1) No Chinese teaching syllabus in college; 2) No systematic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clear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reasonable assessing system although the number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is large; 3) No orderly in-class teaching; 4) Still no “country-specific” Chinese language assessing system so far. All of these mentioned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or improv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trive and implement a new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ing syste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new HSK test. The new testing system is going to be “country-specified”, “combining both teaching and testing” and “to test in order to promote teaching”. How to test Chinese characters will be one of the focus of this new testing system.

Key words : “Country-specified” Chinese test in Korea, Chinese character test,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and testing

투 고 일 : 2016. 1. 10. / 심 사 일 : 2016. 1. 15. ~ 2016. 2.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6. 2. 16.